

韩毓海: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


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在“书香中国·全民阅读大讲堂”开讲

“中华文明最大的优势,就是组织优势。把家与国连在一起叫国家的,世界上只有我们。”“中国的考古研究现在有一个说法,叫作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……”“张载这个人,他往下走,不是往上走。我们今天叫作在基层搞文化振兴,为基层服务。”

4月23日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应邀来南京,在“书香中国·全民阅读大讲堂”开讲,深入浅出又风趣幽默的精彩演讲吸引了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听众。

韩毓海《龙兴:五千年的长征》入选“2021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向社会推荐的12本好书”,此次演讲,通过对中国历史和历代制度的梳理解读该书。

现代快报+ZAKER南京记者
白雁/文 顾炜/摄

5000年文明,考古、文字和地理空间为证

说到中华文明,有个常用的提法——5000年中华文明,但与此同时,也有人质疑,这种说法是不是靠谱?韩毓海援引考古、语言文字和地理空间三方面的证据来给出答案。

从迄今的考古发现看,我们还不能说中华文明是起源最早的,但却是唯一一个一脉相承,从未中断的文明。以语言文字为例,相比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,中国的方块字至今仍在被广泛使用,具有活泼的生命力。而这种文字,历史可以溯源到久远时代,“山东大汶口文化,出土了大约是公元前2000-3000年的陶瓶,陶瓶上写了三个字,日火山。这三个字跟我们现在的字是一样的。文字和语言一直延续下来,全世界没有,就是这头一份。”

讲到中国的语言文字,韩毓海顺带做了一个小小的“科普”。长期以来,学界有一种认识,认为中国文字不是拼音文字,实际上,中国文字是中国式的拼音文字,

“语言文字的延续性,是文明延续性的基本保障,文字学对应的‘小学’,语言学对应的音韵与训诂,是中国固有之学术。清代的常州学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。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我们在翻译佛经时发明的反切,其实就实现了汉字的拼音化、拼读化。另外,值得一提的是,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和其外孙刘逢禄,倡导春秋公羊学派,经世致用,托古改制,更为后来的戊戌变法提供了意识形态,对现代革命思想也有重要影响。”

中华文明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空间上的联系。从“中国”一词,就可以看出这种联系。“‘中国’一词,最早见于出土的西周时代的何尊铭文‘宅兹中国’,铭文记述了周成王营建成周、举行祭祀、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。‘中国’,一说指成周洛邑,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,一说指今晋南地区。不管怎么说,黄土高原上的三个主要河谷平原——渭河谷地、伊洛谷地、汾河谷地,因其土质松软、灌溉便利,且靠近盐池,成为原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。”

中国的考古研究有一个说法: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。这个说法充满诗意,是什么意思?就是中华文明是起源于六个大的文化区,其中有三个是面向海洋,包括辽宁的红山文化、山东的大汶口文化,还有就是江苏;还有三个是面向欧亚大陆、陕西、三星堆,都是这种。这叫满天星斗。

“六个文化区逐渐向黄土高原集中,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,中华文明的月亮在黄土高原上集中兴起。我们知道的以玫瑰花和菊花为图案的图腾,就是从这儿开始。从起源看,中华文明是联系欧亚大陆与海洋的纽带,这也决定了中国和中华文明在地球空间固有的地位。这个文明一开始就在空间上联系农耕文明、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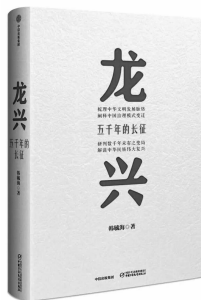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基因里携带着“家国情怀”

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,韩毓海认为中国古代的制度,有一



韩毓海

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,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,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。主要作品有《500年来谁著史: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》《一篇读罢头飞雪:重读马克思》《重读毛泽东:从1893到1949》《龙兴:五千年的长征》等。



《龙兴:五千年的长征》
韩毓海著
中信出版集团出版

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,解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从制度与治理互相联系、制约、矛盾的视角,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相联,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。

——2021年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向社会推荐12本好书发布词

从起源看,中华文明是联系欧亚大陆与海洋的纽带,这也决定了中国和中华文明在地球空间固有的地位

个特点,“这个制度,简单来说,老百姓概括得很准确,《三国演义》里就两个字——分和合。如果用学术化的提法,就叫作封建和郡县,封建叫分,郡县叫合。”

封建的基础,是“嫡庶”与“长幼”的关系。其中,周天子是天下共主,天子之位由其嫡长子继承,天子的弟弟和庶子就是诸侯。诸侯的嫡长子是诸侯,诸侯的弟弟和庶子就是卿大夫。卿大夫的嫡长子继任为卿大夫,卿大夫的弟弟和庶子就是士。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,便大致属于“士”的阶层,他提出“士不可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。士的嫡长子还是士,士的弟弟和庶子就是庶人,也就是老百姓。

封建制的基础是家族制度,家族制度的理想是“小康”。正是基于此,产生了我们熟悉的“家国情怀”,“家国情怀,我们中国人心里都有,不用谁教。中国思想当中最大的两家,儒家和法家。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儒家思想的核心,那就是,没有家哪有国。儒家讲,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,法家则是倒过来的。”

制度的确立并不是一成不变,历史上著名的“周秦之变”,便是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大变革,私人伦理这个大道理关注私人伦理这个小道理。

秦代的郡县,是中央派出去的执法机构。郡县制的基层制度,叫作三长制。到了汉代,门阀制度兴起,基层制度不灵了。

东汉末期产生了村,韩毓海从“村”的繁体字形,做形象的解释,“你看这个字,左边就是一个屯田的屯,右边是个耳朵。当时在西北地区大量屯田,在中原衰落的三长制,在西北保存下来了,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多元一体的郡县制。隋唐以后,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村乡制度的产生。唐朝重新实现了统一,多民族帝国的统一,就是在三长制在西北地区恢复的基础上。”

隋唐时期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工程是大运河,“它解决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循环问题。它贯通了数条河流,这些河的水位不同,经过区域的气候不同,在分段管理运河的过程中,就形成了中国一些重要的地方。比如徐州、蚌埠、洛阳,就是运河上的一个个分段管理的大码头。运河把中国的政治区、军事区、基本经济区等不同的区域联通起来。”

唐代继承发扬了秦汉经营欧亚大陆的遗产,把两汉崩溃后的版图再次整合起来,并加以扩大。但到了唐代末期,随着社会平衡被打破,追求富强的唐帝国陷入了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的循环。怎样走出这个循环?唐代其实把建立这个更加完善的制度的任务留给了后世。

宋代张载:到基层去,为基层服务

中国的文明发展到宋代以后,日渐成熟。与此同时,也带来了新的问题,并出现了后来学界认为的“唐宋之变”。韩毓海从这一历史大转折期出发,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

法—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,考察中国社会的变迁,在此一历史时期,他特别关注到了几个重要人物,其中有王安石和张载。

科举制度在宋代被真正确立,它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也最完善的公务员选拔制度,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,影响至今——“糊名制度”即是一例。

而在宋代,有先见之明的王安石,就对这个制度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。

“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年,这个人不得了。他给宋仁宗上万言书,他说,官员的教、养、取、任皆不得法。什么叫教不得法呢?当时教的都像我们今天中文系学的这诗词歌赋,但是官员是要治国理政的。什么叫养不得法?当时全面科举铺开,官帽子满天飞,公务员太多了,工资低,工资太低了其实就是助他去贪腐。取不得法,是关乎怎么样来录取官员,如果仅仅是考试面试,缺乏实践经验的历练,那可能就只会写材料,不会办事。任不得法,就是说在任上不要出事,不要多事,不要作为,干满五年就自然挪了,按这种考核,有问题。”

王安石看到了宋代的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,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,也看出了问题,并且有人迈出了实际行动的步伐。他们想做事,并且要去基层做事,代表人物就是张载。

“张载,就是提出‘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道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’的那位。他当时护送他父亲的灵柩回来时,经过陕西横渠,觉得这地方不错,就决定留在当地。他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一国,可以改变一乡。张载选择了往下走,用今天的话说,叫作在基层搞文化振兴,为基层服务。”

宋、明、清时期,是中国历史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局,一方面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理性化的治理理念,但是也带来了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问题,因此产生了读书人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问题。

明代以后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,就是中国同时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。历史上,传统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,基本是来自西北边疆,但是明代以后,则面临着来自海洋和草原的双重挑战。所谓的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是从宋明清时代就积累了。到了晚清,随着科举制度的崩溃,中国亟需找到新的方向。

在20世纪初,作为对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回应,无数仁人志士致力于探索适应中国的发展道路,“就像前不久我们看的热播剧《觉醒年代》中那样”。

回顾历史,韩毓海认为,“中华文明的一个巨大优势,就在于制度或组织方面的优势。中国的制度和组织成熟得早,而且在历史中不断完善。今天,我们讨论的家与国、封建、郡县、运河、科举、基层三长等,都是围绕着组织和制度的这种基本优势和特点,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,因为社会就是组织,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,首先也是讲组织优势,当然也是推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。”